

亚洲图书在澳大利亚

顾犇

引言

1995年2月16日，笔者有幸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以后简称NLA)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图书馆和亚洲问题圆桌会议”(National Roundtable on Libraries and Asia, 本文以后简称为“圆桌会议”)。会议历时一天，参加者75人，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亚洲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图书馆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一个英语国家化这么大的力量来发展其亚洲图书的收藏，其原因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做的？效果如何？笔者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些问题。我的同事不厌其烦地为我作出解答，并且为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我感到，我的问题也许就是大家的问题，因此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历史背景

澳大利亚图书馆的亚洲藏书是在最近几十年间才发展起来的，与欧洲和北美洲相比较为落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研究亚洲问题的学者基本上都在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该学校有一个系教授日本的语言和历史。那时，全澳洲没有一个形成规模的亚洲语言出版物的藏书，也没有定期采购亚洲的出版物。可以说，澳洲的藏书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地理性的”；因为它收藏了大量反映其传统的欧洲图书，却很少有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亚洲图书。

二战使澳洲人改变了只注重欧洲文化的观念。1964年，王省吾(Sing-wu Wang)先生开始在NLA工作时，东方部(Orientalia Section)只有40,000册中、日、韩文的藏书。当时NLA的馆长哈罗德·怀特爵士(Sir Harold White)认为，澳大利亚尽管具有欧洲的传统，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与亚洲相邻，因此澳大利亚应当学习、理解其亚洲的近邻，并与之加强合作；今后，一定会有议员、政府官员、学者、商人需要亚洲的图书，所以特邀请王省吾先生来NLA工作，建立和完善亚洲图书的馆藏。此后，NLA开始逐渐建立起亚洲各文种的藏书，定期采购现刊和新书，并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的中央图书馆、平壤的全国代表大会图书馆、汉城的中央图书馆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朝鲜和韩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换关系。这样亚洲图书的馆藏迅速增加，其速度超过了整个图书馆的增长速度。到1985年，东方部已经有324,434册图书，其中包括190,318册中文图书、115,936册日文图书、17,176册朝鲜文图书、629册满文图书、20册蒙文图书以及355册藏文图书。

从整个澳洲来看，自本世纪50年代起，亚洲的地位以及亚洲问题的研究对澳洲未来的重要性日益得到了人们的重视。NLA和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以后简称ANU) 图书馆最先开始了其采访工作, 从而成为全国最主要的亚洲图书馆藏。同时, 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的图书馆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亚洲语言藏书。

当前的形势

在世界政治的领域, 澳洲政府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亚太地区。而且澳洲的经济政策与迅速发展中的亚洲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从每天的报纸上就可以看到, 亚洲国家的贸易机会日益增加, 亚洲人在澳洲的投资份额也在不断上升。

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 亚洲成为众多澳洲旅游者所向往的地方。同时, 日本、台湾、韩国和东南亚的大批观光者对澳洲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甚至改变了澳洲主要风景名胜的布置和广告。近几十年来大批的亚洲移民和亚洲学生到来, 导致了澳洲各大城市街头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亚洲国家的艺术和文化已经成为澳洲艺术节和艺术展览中的一个固定的项目。

澳大利亚总理基廷 (Keating) 于1993年3月说到: “我完全相信, 我们的繁荣、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借以维护和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的能力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将我们的经济与东亚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体。”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 自80年代以来, 全澳洲学习亚洲语言的人数与日俱增。目前大约有120,000个澳大利亚学生在不同的程度上学习日语, 这一数字比英、美、加三国的总和还要多出50%。1994年2月, 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的报告《亚洲语言和澳大利亚经济的未来》 (Asian Languages and Australia's Economic Future) 中指出, 日语、汉语 (普通话)、印尼语、朝鲜语已被指定为全澳洲中小学校应普及的四种亚洲语言。这一建议将会导致学习亚洲语言的人数进一步增加。同时, 从事亚洲问题研究的研究生人数也不断增加。从1989年至1991年, 研究亚洲问题的博士生增加了一倍多 (从40名到84名)。硕士生的人数也翻了一倍。自1990年以来, 澳大利亚亚洲问题研究奖学金 (Australian Awards for Research in Asia) 每年要资助20名研究生, 让他们在亚洲国家进行实地研究。同样, 全国亚洲语言奖学金项目 (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Scholarship Scheme) 每年也要派学习语言的高材生和教师去有关的国家进修, 提高语言能力。在近几十年间, 全国建立起了一系列的亚洲研究中心。迄今为止, 全国已有近50所亚洲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其中大部都是在近四年内建成的。但是, 全澳大利亚的研究资料却仍然主要集中在以上四个图书馆中, 尤其是在堪培拉的两个图书馆 NLA 和 ANU 中; 这两个图书馆的中、日、韩文图书分别有220,000种和150,000种, 占全澳大利亚的一半以上。

馆藏的调查

面对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 图书馆开始考虑如何提供合适的馆藏资源的问题。王省吾先生是最早做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王先生在其1977年和1983年所作的调查报告表明, 除了NLA、ANU、以及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以外, 其它图书馆的东亚图书的收藏情况基本上都不能适应需要。

近年来最重要的要数英格尔森报告。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ASAA -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前主席约翰·英格尔森(John Ingleson)教授综述了澳大利亚各大学中的亚洲研究现状,指出了未来的趋势,向政府提出了适应形势的建议。报告题为《亚洲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中亚洲研究和语言教学之研究报告》(Asia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for the Inquiry into the Teaching of Asian Studies and Languages in Higher Education),它于1989年1月呈交给了亚洲研究理事会(Asian Studies Council - 以后简称ASC),其中的建议成为后来一系列工作的基础。

英格尔森报告指出,澳洲各图书馆应在亚洲资料的采访工作中精诚合作,并努力建立、维护这一部份的藏书,提供编目力量。在使藏书建设系统化、合理化的基础上,向高等院校提供具有国际标准的资源。此外,还应当有一个有效的和低收费的存取和传播系统。

英格尔森报告还指出,当时的书刊编目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各大图书馆中的亚洲藏书(特别是中文藏书)都未经过完全的编目。80年代,许多未编书以韦氏拼音罗马化的方式进入了ABN(Australian Bibliographic Network - 澳大利亚书目网络)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希望有自动化系统,使非罗马字符能在ABN上运行。

该报告还指出了具有亚洲专业的图书馆员工的不足,希望能加强员工培训,造就更多的合格馆员。

然而,英格尔森报告未能获得ASC重视。1990年12月,国家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收到了一份题为《高等院校中的图书馆服务问题》(Library Provis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的报告(简称罗斯报告(Ross Report))。该报告支持英格尔森报告的观点,重新提出了英格尔森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包括亚洲专业员工不足、采访困难、编目积压、非罗马字符自动化等问题。报告还指出,亚洲研究项目的日益发展向图书馆提出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有关机构乃至联邦政府的重视。

第一次圆桌会议

1991年5月,NLA和ANU联合发起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圆桌会议,以考虑全国性的战略。当时,几乎所有具有亚洲藏书的图书馆都参加了这一会议。与会者也一致同意上述几个报告中的观点。亚洲图书资料的进一步调查

第一次圆桌会议以后,国家就业、教育和培训部(DEET -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给NLA、ANU和悉尼大学一笔资金,用于研究全国亚洲图书资源共享的问题,其中一部份资金用于全国共享的CJK(中、日、韩文)图书资料的检索系统,这就导致了目前将要实施的CJK项目。

1992年4月至5月,ANU的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和NLA的安德鲁·高斯林(Andrew Gosling)会见了堪培拉、佩思、阿德雷得、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的80多位学者和图书馆员,了解了亚洲问题教学和研究的趋势,以及他们对在全国范围内改进亚洲图书资源的要求。从地理上来看,全澳洲在亚洲问题方面的高等教学和研究的重点

仍然是东亚(包括中国大陆、日本、朝鲜、韩国、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东盟国家和印度支那)。

第二次圆桌会议

第二次圆桌会议于1993年3月18日在NLA召开,与会者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各省的50多名代表。在会上,NLA的副馆长埃里克·韦恩赖特(Eric Wainwright)介绍了第一次会议以来的进展,包括全国CJK项目的资金来源以及1992年NLA和ANU联合进行调查的结果。代表们提出的建议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 书目控制:将ABN中的亚洲报纸编成书目,在各图书馆中交流,以更新馆藏记录;ABN办公室负责推广关于CJK文字和其它亚洲文字之澳大利亚标准的协议;ABN鼓励生产用于亚洲资料的合适的规范控制参考工具;ABN办公室考虑制作亚洲图书采访书目的可行性。
- 信息服务:作一个亚洲数据库的调查,并包括CARL和UnCover等服务。
- 员工队伍:为了提高员工素质,NLA应当向图书馆学院和澳大利亚图书情报协会(ALIA -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提出建议,保证图书馆学院增加其亚洲相关课程,使ALIA教育委员会考虑如何增加图书馆教育中的亚洲部分,使ALIA考虑开设亚洲图书馆学的继续教育课程。
- 藏书建设:NLA应加强宣传澳大利亚的亚洲图书藏书建设方针;加强与亚洲其它地区的合作,ASAA应考虑南亚藏书不足的问题。
- 合作问题:圆桌会议应当定期召开(18个月或24个月),其报告和建议应提前传阅。
- 研究基金:ASAA应负责这一工作。
- 地区的作用:澳大利亚图书情报国际服务处(ALIIS -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应考虑到澳大利亚和亚洲学术机构之间合作中图书馆的作用。

馆藏纲要和DNC

在继续我们的介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馆藏纲要和DNC这两个概念。

“馆藏纲要”(原文为Conspectus,作者权作此译)最初由美国的研究图书馆集团(RLG - Research Libraries Group)采用,作为描述图书馆藏书和刻划藏书情况之数据库的一种标准化的手段。

澳大利亚的图书馆界认识到,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传统,使各自的馆藏被其它图书馆了解,并且通过馆际互借满足读者的需要。这样,就产生了DNC(Distributed National Collection) [\[1\]](#)这一概念,使各图书馆的馆藏的目录能

够为公众所存取，并通过馆际传递系统到用户的手上。DNC主要所涉及的问题是藏书建设、书目控制、存取、保护和全国协调等等。

在藏书建设方面，DNC的目的要使得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在作出采购决定之前，先了解其它图书馆的藏书力量和藏书倾向。从而，“馆藏纲要”就成了一个很有力的手段。有了这一工具，人们就可以确定重点藏书，使之联合起来，满足国家或地区对某些主题的需要。

澳大利亚馆藏纲要是在上述目的基础上，于1989年开始讨论形成的，它基于美国的纲要，针对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加以修改而成。位于NLA的DNC办公室负责馆藏纲要实施的日常事务。

在馆藏纲要中，有一个收藏水平指数，从0到5，以衡量一个图书馆的“现今收藏水平”(CL)、“采访任务”(AC)、“收藏目标”(GL)、“保存任务”(PC)。对于每个图书馆而言，每一个主题上都有CL、AC、GL、PC相应的值(从0到5)。因此，图书馆可以据此来衡量自己的收藏工作进行的情况，其它图书馆也可以此作为采访工作的参考。在第三次圆桌会议中，代表们也强调了各收藏亚洲图书的图书馆采用馆藏纲要的重要性。

第三次圆桌会议

第三次圆桌会议于1995年2月16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地的图书馆员、学者、政府官员，共75名代表。大会上的主要发言包括：ASAA的主席贝弗莉·胡珀(Beverly Hooper)所作的“亚洲研究在澳大利亚：趋势和展望”、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以后简称ARC)主席马克斯·布伦南(Max Brennan)所作的“ARC和对亚洲研究的资助”、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教授罗宾·杰弗里(Robin Jeffrey)所作的“南亚：澳大利亚的未来研究趋势”。

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们所重视的问题。例如，从1991年至1995年，亚洲研究是ARC资助的五个重点领域之一。1995年，ARC计划资助的课题包括：

- 亚太地区农业和粮食结构之改造；
- 正在形成中的亚太多边关系；
- 中国的外资工厂；
- 妇女：当代中国商业主义和国家；
- 日本自然灾害救助的政治和管理；
- 巴厘的工业化和文化变迁。

在1995年对研究基础设施的资助中，申请的项目有173个，共6,300万澳元；获得资助的有59个项目，共1,480万澳元。其中，关于图书馆藏书和数据库建立的申请项目有25个，计600万澳元；获得资助的有6个项目，共100万澳元。而在以上6个项目中，有两个是与亚

洲问题相关的。

会议分六个小组。在会议前，会务组的工作人员已通过电子方式与各代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形成了文字建议的草稿。在会上，大家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代表们提出的主要建议如下：

- 南亚问题：全国南亚问题研究中心应广泛调查澳大利亚南亚问题的研究情况；NLA应当检查其南亚图书的采访水平，考虑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包括政府出版物的交换（NLA已经同意在今后的12至18个月内完成这一任务）；寻求适当的资助，保证南亚问题学者的图书馆资源。
- 藏书建设和藏书协议：在1995年12月之前，具有亚洲藏书的澳大利亚图书馆应表明其愿意讨论藏书和存取协议的范围；在1996年12月之前，应达成亚洲资料收藏协议的一个网络；要强调对馆藏纲要的应用。
- 网络、电子出版物和Internet：NLA应保证使NDIS系统（将取代ABN的新系统）的功能得到扩充，以保证1996年以后非罗马字符的显示和检索，并在扩充前的NDIS和全国CJK系统之间有一个使用方便的界面。
- 员工培训：在亚洲研究的图书馆领域有一个非正式的小组和一个行动计划，保证近期的和长期的员工培训需要；该小组应在1995年底以前了解各图书馆对于员工培训类型的观点，以及各图书馆学院亚洲课程的设置情况。
- 亚洲馆藏的保护：各图书馆应与DNC办公室合作，探讨记录亚洲字库保护需要在馆藏纲要数据库中记录这一信息的保护准则；与DNC办公室合作探讨一种描述馆藏“重要性”的分类系统。
- 书目存取：明确应存入全国书目数据库中的最重要的编目数据文件，并建立一种机制，以保证与数据准备、数据更新或格式转换相关的资金来源；这些最重要的数据包括东亚的连续出版物（包括报纸）、东亚的图书、一般的亚洲连续出版物（包括报纸），其中最重要的数据是NLA、ANU、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的数据。

目前，代表们提出的建议正在汇总过程中。若干个月以后，一旦形成决议，就会对澳大利亚的亚洲图书藏书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CJK项目

CJK项目的全称是“全国中、日、韩文项目”（National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Project）。在第一次圆桌会议上，人们一致达成了如下的意见：NLA、ANU、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应共同探讨一个共享的局部系统，以支持CJK文字和其它非罗马字符。1992年，ARC拨给ANU一笔资金，用于CJK项目的可行性研究。1993年至1994年，ARC给ANU一笔拨款，用于购买合适的系统，使之成为上述四个图书馆中的骨干机构。与此同时，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莫尔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格里菲思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和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也加入了这一项目，从而项目的成员达到了八个。同

年, Innovative Interfaces 和 Digital 公司被选为系统的提供商, 软件主要采用 Innopac CJK 系统。到目前为止(1995年2月), 项目负责人正在与有关的公司进行签署合同的谈判工作。项目的实施时间要看谈判的情况, 大约要到今年4月以后。

CJK项目的是: “促进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友好关系, 向澳大利亚的图书馆及其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 使之能够存取全国各图书馆的中、日、韩文图书资料”。其服务有如下几个方面:

- 使图书馆能够建立其馆藏 CJK 资料的目录和规范数据, 将 CJK 字符加入数据中, 并通过全国书目网络实现共享;
- 为 CJK 资料提供拷贝编目服务;
- 使图书馆用户和研究机构的员工能检索其图书馆中所藏的 CJK 资料, 并能用 CJK 文字来检索和显示检索结果;
- 使图书馆用户和员工能检索其它图书馆的 CJK 资料, 亦即提供全国联合目录的功能; 同时, 还将提供存取其它数据库的网关。

尽管目前参加 CJK 项目的只有 8 个图书馆, 但是项目还希望其它图书馆能参加进来。一旦系统开始运行, 项目的工作人员就要加强该系统的推广工作, 并提供两个层次上的应用: 一个层次仅仅允许数据库的检索, 另一个层次不仅可以检索, 而且还允许数据的提供(编目)和数据的提取。

收费问题目前尚未形成结论, 目前初步设想是采用按月付费的方式。存取可以通过 Internet 来进行; 对于 ABN 的用户而言, 也可以通过网关从 ABN 上来存取, 但是在 ABN 上只能看到数据库中的罗马化部分。NLA 将在亚洲部 (Asian Collections) 的阅览室中按装一个 PC 机, 免费向读者提供 CJK 文字的检索。

接下来是关于设备问题。要用 CJK 字符来进行检索或编目的用户必须有一个微机或 X 终端、一种附加的软件、与 Internet 的连接。目前项目正在 ETen、Join、MASS 这三种软件中选择, 人们较倾向于采用 MASS (Multi-lingual Application Support Service), 因为它采用 Windows 环境, 用户友善, 并且在处理日文字符时较为方便。如果采用 MASS, 则最好有 X 终端或者带有 X 终端仿真的 486 PC 机。

关于数据来源问题。尽管 CJK 系统可以提供原始的编目, 但是其数据库中大部分的数据还是必须从其它机构或网络上获得。最初的数据包括:

- 所有 LC 的 CJK 图书数据磁带;
- 所有 LC 的 CJK 连续出版物数据磁带(LC 的书刊记录共 175,000 个);
- 部分 OCLC 和 RLIN 的 CJK 记录(分别为 100,000 和 140,000 个);
- ABN 上 CJK 资料的完整记录以及其中所附的馆藏记录(310,000 个)。

此后不久, 还将安装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转换成 USMARC 的日本国

立国会图书馆的数据。最后，还希望能从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等地的国家图书馆得到数据，但是首先必须解决数据格式的问题。

除此以外，CJK项目所面临的问题还包括：部分图书馆中拼音罗马化中著者人名与LC人名规范之间的不同、韦氏音标与汉语拼音之间的不同等等。笔者有机会参加了项目的讨论，有许多人认为应该用汉语拼音取代韦氏音标；这是因为目前汉语图书的读者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却根本不了解韦氏音标；而且，澳洲各大学都用汉语拼音教中文，公共图书馆用汉语拼音编目，各种报刊杂志中出现的中国人名或地名也都用汉语拼音。但是，系统必须能够将数据从韦氏音标向汉语拼音转换，或者从汉语拼音向韦氏音标转换。这些转换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要耗费一定的资金。不管如何，图书馆编目的工作会增加，因为CJK的记录要同时包括题名和作者的汉字字符以及罗马化。

澳大利亚各图书馆的藏书现状

1994年12月，DNC办公室公布了《DNC亚洲图书馆资料调查结果》，详细介绍了各图书馆的亚洲图书的收藏水平。以NLA和ANU为例，我们有如下数据（其中IL表示当地语言，WL表示西语；数量单位是“册”；预算单位是“澳元”）：

1) NLA:

地区	IL水平	WL水平	IL数量	WL数量	IL预算	WL预算
东亚	4	4	384,000	318,000	649,700	100,000
南亚	3	3	990	22,550	1,500	65,500
东南亚	4	4	225,600	170,000	89,400	104,300
中亚	1	1	60	1,460	600	5,500
西亚	1	1	180	4,790	1,200	16,000
共计	-	-	610,830	516,800	742,400	291,300

2) ANU:

地区	IL水平	WL水平	IL数量	WL数量	IL预算	WL预算
东亚	4	4	225,000	-	252,000	66,000
南亚	3	3	16,000	21,000	85,000	35,000
东南亚	4	4	30,000	60,000	45,000	65,000

中亚	-	3	0	2,000	-	-
西亚	3	3	3,000	6,000	-	20,000
共计	-	-	274,000	89,000	304,500*	227,000*

3) 全国：

地区	IL 数量	WL 数量	IL 预算	WL 预算
东亚	807,609	453,407	1,243,377	297,033
南亚	22,629	92,388	12,500	118,730
东南亚	292,883	303,603	200,813	285,247
中亚	1,739	5,234	600	5,650
西亚	5,787	19,529	12,000	36,750
共计	1,054,000*	843,580*	1,486,490*	911,980*

(* 预算数字总和有误，原文如此)

关于中、日、韩文字，我们有如下的数据：

1) 书刊资料

图书馆	中文	日文	韩文	总计	年编目量
NLA	137,075	67,267	17,095	221,437	13,181
ANU	97,500	48,000	4,000	149,500	4,269
总计**	346,446	156,332	23,940	526,718	23,524

2) 非书资料

图书馆	中文	日文	韩文	总计
NLA	4,100	3,000	200	7,300
ANU	0	0	0	0
总计**	5,482	3,242	200	8,924

(** 其中“总计”指参加CJK项目的八所大学的总计)

结束语

对于亚洲图书，图书馆面临着采购、加工、存取这三个方面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澳洲各图书馆的亚洲图书采购经费尚未有大的增加。但是，在存取方面（即资源共享方面），澳洲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读到这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国家也化了很大的力量去收集国外图书资料，特别是英文和日文图书资料。在发展图书馆自动化和网络化的过程中，也存在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效果如何？澳洲的经验有什么地方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呢？我觉得，澳洲的馆际协调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应当取其之长，补己之短。限于篇幅，本文只介绍到此。

参考文献

- [1] Wang, Sing-wu: "Remembering Sir Harold White", *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 vol. 24, no. 3 (September 1993), pp 186-91;
- [2] Gosling, Andrew: "Reports and Roundtables: Australia's Asian Collections in the 1990s", *Australian Library Review*, vol. 11, no. 3 (August 1994), pp. 327-36;
- [3] Sexton, Marie: "Change and Opportunity: Policy and Management Issues for Asian Librarianship in Australia: Future Scenarios", *Australian Library Review*, vol. 11, no. 3 (August 1994), pp. 349-53;
- [4] Miller, George: "Asian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in a Changing World", *Australian Library Review*, vol. 11, no. 3 (August 1994), pp. 318-26;
- [5] Groom, Lind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Projec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ese Document Database, 27 February - 4 March, 1995;
- [6] Gosling, Andrew: "National Roundtable on Libraries and Asia", *East Asian Library Resources Group of Australia Newsletter*, no. 24 (May 1993), pp. 14-8;
- [7] RMG Consultants, Inc. & National CJK Project: *Request for Proposal for Automated Systems and Services for Australian National CJK Project (NCJKP)*, RMG Consultants, Inc., 1993;
- [8] Gosling, Andrew: "3rd National Roundtable on Libraries and Asia", *Gateway*, no. 14, (to be published).
- [9] DNC Office: *Results of the DNC Asian Library Materials Survey*,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December 1994.

1995年3月16日于堪培拉

注[1] DNC的概念包括的范围很广，其主要思路就是馆藏合作。因为难以用合适的词汇来表达，作者在此不作翻译。

《北京图书馆馆刊》(*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1995年6月号（第1-2期），第127-133页

[转主页 / Back to HomePage](#)